

Exploring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into Gener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aking *World History of Maritime Civilization* at Wuha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HU Jie

CIBOS, Wuhan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October 20, 2024

Accepted: November 12, 2024

Published: March 31,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HU Jie. (2025). Exploring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into Gener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aking *World History of Maritime Civilization* at Wuha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1), 185–193, DOI: 10.53789/j.1653–0465.2025.0501.020. 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5.0501.020>. p

The research is supported by ‘World History of Maritime Civilization’ from the Founda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3.0, Wuhan University”, and also by Funding for basic research of Wuhan University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grants.

Abstract: *World History of Maritime Civilization* adheres to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GCI) as the guidance and initially explores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GCI into gener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First of all, general education should face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specifically, we must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time civilization and continental civiliz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ity and symbiosis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dvanced and backward nature of civilization dialectically. Secondly, general education should advocate patriotism, including establishing a grand historical view for “taking history as a mirror”, being vigilant against “West Centrism” while “taking him as a mirror”, and also keeping up with great national concerns in setting aspirations. Lastly, general educatio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hinese narrative”, specifically speaking, No. 1, adhering to the equality of civilization and opposing the “centralism”; No. 2, adhering to diversity and opposing the “model theory”; No. 3, adhering to the inclusiveness and oppose the “conflict theory”.

Keywords: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gener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World History of Maritime Civilization*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HU Jie, male, born in Wuhan, Hubei Province, Ph. D. in history, a postdoctoral fellow in law, Associate professor at China Institute of Boundary and Ocean Studies (CIBOS), Wuhan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fellow a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Maritime Rights (CICTSMR). His current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UK’s maritime strategy and world history of maritime civilization.



「全球文明倡議」融入大學通識教育的路徑探索 ——以武漢大學《世界海洋文明史》課程為例

胡 傑

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

摘 要：《世界海洋文明史》堅持以全球文明倡議為指導，在教學中嘗試摸索全球文明倡議融入大學通識教育的路徑。首先，大學通識教育要直面「文明衝突」，包括辯證看待海洋文明與大陸文明的關係、辯證看待文明的民族性與共生性關係、辯證看待文明的先進性與落後性關係；其次，大學通識教育要宣導「家國情懷」，包括「以史為鑒」首先要樹立大歷史觀、「以他為鏡」須警惕西方中心主義、「向海搏擊」要緊跟國家重大關切；第三，大學通識教育要注重「中國敘事」，具體而言有三點：其一，堅持文明的平等性，反對「中心論」；其二，堅持文明的多樣性，反對「模式論」；其三，堅持文明的包容性，反對「衝突論」。

關鍵詞：全球文明倡議；大學通識教育；《世界海洋文明史》

基金項目：本文是「武大通識 3.0」一般項目「世界海洋文明史」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同時受武漢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資助。

大學通識教育秉持「博雅弘毅、文明以止、成人成才、四通六識」的理念，強調以「以成人教育統領成才教育」^①。要實現成人成才的目標，首先要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習近平總書記在 2023 年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議，用先進的文明理念塑造學生形成正確的三觀，為培養學生成為博雅君子指明了方向，這一倡議更是推進大學通識教育改革創新的智慧源泉。作為武漢大學開設的「通識 3.0」課程，《世界海洋文明史》在教學設計中強調思想性和學術性，始終堅持與時俱進，全面吸收全球文明倡議的思想精髓，以期更好地說明學生認清自我、認識世界、認知生命。

一、大學通識教育要直面「文明衝突」

大學通識教育的課程設置雖然門類繁多，但共通的特點在於不以提升學生的專業技能為目標，而旨在鼓勵其從中華文化與世界文明、科學精神與人文關懷、個人發展與家國情懷、哲理思考與現實關照等多個維度，對人生、社會、國家、世界、宇宙等重大問題開展「終極思考」，引導學生實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藍圖。在西方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範式盛行的當下，無論是哪種類型的通識課程，都要「跳出專題看專題」，不局限於基本的知識傳授，而是深入思考在教學中如何平衡本土與外來、傳統與現代、傳承與借鑒、共性與特性等的關係，實際上是要直面撒母耳·亨廷頓提出的「文明的衝突」問題，本質上是世界觀和價值觀教育。「中華文化與世界文明」板塊的系列課程更是要從堅持「四個自信」的高度，引導學生立足中國、放眼世界、胸懷天下。例如，在《世界海洋文明史》的教學中，貫穿始終的主線是多層次、全方位地看待海洋文明，既要海納百川、相容並蓄，也要突出「中國風範」、彰顯「中國氣度」，避免不自覺地跌入「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陷阱之中。

（一）要辯證看待海洋文明與大陸文明的關係

在西方的「文明中心論」「文明優越論」「文明衝突論」的影響下，海洋文明被貼上了先進、民主、開放的標籤，大陸文明則被視為落後、專制、封閉的「異類」，進而將「言必稱希臘」的西方文明定性為海洋文明，而將具有深厚農耕文化積澱的文明斥為大陸文明。這種論調投射到國際關係領域，就是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即機械地將歷史上陸權導向的斯巴達和威廉二世時代的德國分別與奉行「海權主義」的雅典和「日不落帝國」時期的英國對立起來，借「議古論今」推導出「大陸主義」的中國必將與「海洋主義」的美國發生衝突。「修昔底德陷阱」儘管在邏輯上並不夠嚴密，學理上也存在諸多謬誤，且自問世以來也遭到頗多質疑和批判，但在當下美國大肆渲染中美戰略競爭的背景下，這種偏執的說法在西方仍然大行其道。除了炒作所謂崛起國與霸權國的權力之爭外，「修昔底德陷阱」還刻意製造海陸二元對立，暗示兩種發展道路是「非此即彼」甚至「你死我活」的關係，最終還是旨在為確保「西方文明的勝利」搖旗吶喊。

有鑑於此，《世界海洋文明史》以批判精神推進教學，首先在概論部分闡釋海洋文明的相關概念，特別強調海洋文明與大陸文明並非高低優劣的二元對立，尤其是不能以片面地將海洋文明解讀為「古希臘式」或「西方式」的，即並非地理上的島國、半島型、瀕海型的「小國寡民式」國家才能發展出海洋文明，大陸型國家同樣具備面向海洋發展的需要和動力，並取得了不可忽視的成就。同時，著重指出海陸衝突只是文明發展過程中的部分現象而非絕對規律。海洋文明與大陸文明並非孤立和隔絕，而是有機互動的關係，共同推動了人類參與世界發展的歷程。

（二）要辯證看待文明的民族性與共生性關係

文明的民族性與共生性關係涉及如何界定海洋文明的複雜問題。誠然，零星的、分散的海洋活動，如航海、捕魚、制鹽等，若不能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佔據重要地位，這樣的文明形態不能稱為海洋文明，但海洋文明的形態並非只有「古希臘式」的。長期以來，在西方敘事的影響下，我們幾乎默認海洋文明就是農耕經濟不發達、依賴貿易和航運的「小國寡民式」的民族或國家，歷史上的迦太基、雅典、威尼斯等，乃至近代的葡萄牙、荷蘭、英國都是典型代表，而統一、龐大的中央帝國唯有靠農耕經濟支撐，因此熱衷於陸上擴張而非海上開拓。這種論斷雖有其道理，但若固化思維，則會片面地將「古希臘模式」視為海洋文明的唯一形態，從而忽視甚至排斥西方文化圈以外的海洋文明的多樣化表現形式。事實上，中國很早就孕育出了海洋文明，自春秋戰國至西漢，北方沿海的東夷族群和南方沿海的百越族群完全稱得上是「靠海而生」。只不過，在秦漢大一統王朝建立後，這些沿海地帶的海洋文明體被納入以農耕經濟為主的中原王朝版圖，由此奠定了中華文明經濟結構「陸主海從」的基本格局。即便如此，隨著經濟重心的持續南移，由唐入宋，南方海洋貿易日漸興盛。至明清之際，官方雖叫停鄭和下西洋並屢立海禁，但東南沿海的民間貿易、私人拓殖和海外遷徙一直不斷，並對日本、東南亞等地的風土人情、社會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彰顯了中華海洋文明的生命力。從這個角度來說，儒家文化圈也可被視為中華海洋文明圈。顯然，採用西方敘事的「古希臘模式」無法解釋大一統的中華文明雖以農業為基，但為何始終保持了對海洋的親近且建樹頗多，若僅以經濟占比、通過強調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單一性或純粹性來否定中華海洋文明的存在顯然是片面的。更何況，中國自古就是多民族和諧共存、命運與共的統一體，東夷族群、百越族群等沿海地帶諸多「海上民族」同樣創造了燦爛的文明成就，成為中華民族對世界海洋文明發展做出卓越貢獻的有力證明。無論是在海上還是陸上，中華民族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單純以海洋文明或大陸文明來給中華文明定性都是以偏概全。

也正因為如此，《世界海洋文明史》雖冠以「世界」之名，但必須始終以中國的海洋發展大業為核心關切，



在教學中正本清源以糾正若干存在已久的觀念誤區：其一，不能因為近代中國屈辱的歷史、「列強從海上而來」就否定我們曾創造過輝煌的海洋文明，更不能斷言中華民族是保守、封閉、畏懼海洋的農耕民族；其二，中華海洋文明是原生型文明，具有開放性、和平性、陸海互動等特徵，不同於帶有鮮明「血與火」暴力征服和掠奪烙印的西方海洋文明；其三，以海上絲綢之路為例證，中華海洋文明與地中海世界、阿拉伯世界有著悠久的交往史，涵蓋商貿、人文等多個領域，特別是在造船、航海等方面有著積極的技術交流，同活躍在地中海和印度洋的諸多海洋文明體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充分體現了文明的共生性特點；其四，中華海洋文明在經歷了近代的頓挫後正在走向復興^②，將借鑒、吸收包括西方成就在內的一切先進成果，但不能以西方海洋文明的標準、觀念、模式等來定義現代化，必須堅決反對「文化霸權」。

一言概之，儘管中華海洋文明是不同于西方海洋文明的「異質文明」，但在「軸心時代」，中華先賢與古希臘、古印度的哲人們同樣在思考包括人海關係在內的生命奧秘、宇宙本源等哲理問題，甚至得出了相近的答案，這便是文明共生的不謀而合之妙。

（三）要辯證看待文明的先進性與落後性關係

文明之間不免存在比較，但在比較時要注意兼顧縱向比較和橫向比較。同時，在橫向比較時也要意識到，文明的先進性與落後性只是相對而言，更不能用停滯、固化的思維去看待文明的先進性和落後性，也不能因為一時的落後而否定某種文明內在的先進因數。

《世界海洋文明史》在比較各種類型海洋文明史時，注重長時段考察及比較物件的多元性。例如，對於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個地理大發現的先行者，我們一方面將其與同一時代的東方諸國做比，強調火器技術的差距是這一時期西方文明開始領先於東方文明的標誌。前者以葡萄牙和西班牙為代表，後者以奧斯曼帝國、印度諸邦和大明王朝為代表，代表性事件就是 1509 年的第烏海戰和 1571 的勒班陀海戰。就此而言，葡萄牙和西班牙對日漸衰朽的伊斯蘭諸國是先進文明。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認識到，葡萄牙和西班牙雖然從殖民地掠奪了大量金銀，但這些金銀未能成為助推兩國工商業發展的原始資本，而僅僅是為了滿足兩國宮廷和貴族的奢侈消費需要，並以各種形式流入荷蘭、英國、法國等後起國家之手，極大地刺激了後者海洋產業鏈的發展，確立起面向海洋發展的基本國策。無疑，同為西方海洋文明，相較於荷蘭、英國、法國等，葡萄牙和西班牙又是落後的。

除此之外，《世界海洋文明史》立足全球視野，深入闡釋不同地域、不同模式的海洋文明之間的衝突和交融，尤為重視梳理阿拉伯世界、印度、中國等非西方海洋文明的發展歷程，概括其特點及精神內核，並分析其自地理大發現和大航海時代開啟以來遭受西方衝擊的原因。儘管不同程度地被西方海洋文明打擊、蠶食甚至征服，但並不能就此斷定東方海洋文明本質上是落後於西方海洋文明的，更應將這種近代的挫敗理解為在物質、技術和生產方式層面的暫時落伍，我們對文明的先進性和落後性的理解還應從精神層面切入。以中國為例。明末清初，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的航海家和殖民者開始與廣東、福建沿海等地有了接觸，但即便擁有相對先進的火器，這些裝備「堅船利炮」的殖民者在明末地方武裝的清剿下紛紛敗下陣來。不僅如此，以王直、鄭芝龍為代表的中國本土海商集團還成為西方殖民勢力的有力競爭者。西方殖民勢力可以征服印度、東南亞的諸多土邦，但不可能瓦解擁有深厚陸權基礎、海陸發展密不可分的中國。在 1840 年之後，我們也很快掀起了以學習西方為主題的洋務運動。這一切都充分體現出中華海洋文明具有強大的韌性和糾錯能力，這樣的文明哪怕暫時在物質和技術層面落後甚至挨打，但開放、包容、善於學習的精神特質決定了它終將浴火重生並煥然一新。

二、大學通識教育要宣導「家國情懷」

大學通識教育首要關注人的成長,但不能僅僅將實現個人價值作為終極目標,而是要在啟發學生哲理思辨的同時充分做到現實關照,既要聆聽「風聲雨聲讀書聲」,又要關心「家事國事天下事」,引導學生樹立將個人發展與國家和民族復興大業融為一體的遠大志向,進而追求個人命運與全人類幸福同頻共振的更高思想境界。《世界海洋文明史》雖以「讀史、品史、問史」為主,但始終強調要善於總結世界主要海洋強國在海洋發展道路上的經驗教訓,為中國建設海洋強國提供啟示。不僅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對海洋問題的思考要打破民族、國家、區域的鴻溝,以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共同推進全球海洋治理、實現人海和諧共生為最高理想。由此而言,通過以史為鑒、以他為鏡為中華海洋文明的全面復興鼓與呼,借由對千年來人海關係的反思來展望新時代世界海洋文明的發展方向,鼓勵學生聯繫自身實際、發揮專業優長制訂「向海搏擊」的方案,是《世界海洋文明史》的主旨追求。簡言之,《世界海洋文明史》在教學中始終洋溢著有高度、有深度、有溫度、有銳度的「家國情懷」。同時,教學以全球文明倡議為指導,有助於我們洞悉某些西方國家在國際政治中高舉所謂「價值觀外交」大旗的思想淵源,揭批其大肆鼓噪所謂「民主對抗威權」、維護所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虛偽本質。

(一)「以史為鑒」首先要樹立大歷史觀

在地理大發現和大航海浪潮的衝擊下,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開始逐漸形成,以往主要是分散發展的各大文明體的交往顯著增多,彼此的聯繫、羈絆、糾葛日益加深。在這一過程中,西方世界全面崛起,而世界其他地區的傳統海洋文明體則漸趨衰落甚至消亡,按照西方模式建構的近代海洋文明似乎成為唯一先進的海洋文明,進而佔據了對海洋文明的機理、內涵、形式的唯一解釋權。本質上,這就是以「西方中心主義」或「歐洲中心主義」定義世界的一大表現。在長期的潛移默化影響下,我們似乎也默認了世界史是以西方文明為主線的外國史,即將中國排除在外。「以史為鑒」的大歷史觀就是要反對這種錯誤傾向,正如著名歷史學家吳于廑先生反復強調的,世界史不是中國以外的他國史或域外史,也不是各國歷史的簡單疊加,而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整體世界的歷史^③。推而廣之,世界海洋文明史也不是中國以外的以西方為中心的海洋文明史,而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多種海洋文明孕育、繁衍、發展、交流、互動的歷史。在這個邏輯上,我們的「以史為鑒」之「史」既包括地中海世界、大西洋世界、阿拉伯世界等域外文明的海洋實踐經歷,又有中華民族自身的海洋經略歷程。對於西方文明,不僅要肯定其近代揚帆出海、探索未知新世界的勇氣,也要批判其暴力征服、殘暴掠奪的本性;對於中華文明,不僅要弘揚開拓絲路、溝通萬方的歷史榮光,也要反思中國自鄭和下西洋後總體上「閉關鎖國」「遷界禁海」帶來的慘痛後果。

當然,在全球文明倡議的理念指引下,我們在肯定歷史上的中華海洋文明圈成就的同時,也要謹慎對待「天下主義」和朝貢制度,尤其是在《世界海洋文明史》教學中對其僅做客觀描述和歷史評價,而避免過多聯繫現實將其推演開來,防止鼓吹所謂「中國文化威脅論」「中華帝國主義」的雜音沉渣泛起,以及周邊部分國家的過度聯想,強調今日中國建設海洋強國奉行的是平等、和平、合作等基本原則,攜手各國共建海洋命運共同體。

(二)「以他為鏡」須警惕西方中心主義

「以他為鏡」中的「他」包括但不限於西方海洋文明,「鏡」則意味著不僅要學習、借鑒「他者」的成功經驗和有益做法,而且也要汲取、警惕其失敗教訓。歷史上,西方國家通過殖民征服和掠奪積累了大量原始資



本，為工業化創造了條件。儘管二戰後廣大殖民地陸續獲得獨立，但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國家依然積極推行「新殖民主義」，憑藉其掌控的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繼續剝削第三世界，這體現出其依然奉行舊式的「西方式現代化」方式，將「國強必霸」視為西方海洋文明走過的道路和必然的歷史規律，不相信中國可以走出和平發展的新路，更不承認中華海洋文明的和平性本質。

警惕西方中心主義還要做到堅持「四個自信」，其中就包括從「文化自信」高度對中華海洋文明的深厚積澱、韌性和生命力的自信。一方面，我們要承認近代我們確實落後了，尤其是很大程度上因為對海洋的疏遠和隔閡而造成了對世界大勢的昏聩不明，進而導致 1840 年之後被侵略、被掠奪、被奴役的屈辱歷史；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注意不要過多用悲情敘事來描述近代中國屈辱的海洋史，要認清這段屈辱的歷史只是上千年中華海洋文明的短暫頓挫期，不能因此否定中華海洋文明的輝煌成就和特點，需要反思的是傳統發展模式帶來的體制惰性、思維慣性和創新意識衰退等，更多的是要汲取教訓、守正創新、面向未來。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因為近代的落後挨打就預設「西方模式」是先進海洋文明的唯一模式，而是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批判地借鑒吸收其經驗，結合中華海洋文明的優良傳統和中國的現實國情，在新時代建設海洋強國的征途中走出一條適合中國的道路。

（三）「向海搏擊」要緊跟國家重大關切

黨的十八大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建設海洋強國的目標。建設海洋強國，首先就要堅決維護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全面提升國家海洋綜合實力。同時，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全球大國、一個正處於復興之中的海洋大國，中國肩負著積極參與並推進全球海洋治理的重任。自 2013 年以來，我們先後提出了「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藍色夥伴關係」「海洋命運共同體」等一系列倡議，這些倡議可以視為我們打破西方話語霸權、發出中國聲音、貢獻中國智慧的「組合拳」。在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背景下，如何細化、落實上述「中國方案」需要社會各界群策群力。因此，《世界海洋文明史》並不停留在「說史」上，而是積極關注時政動態，強調緊跟國家重大關切、為國家海洋事業建言獻策。

在教學設計上，《世界海洋文明史》在專題研究的三個章節，分別闡釋了島國型大國、陸海複合型大國、陸地中心型大國海洋戰略的特點和影響，尤其重點分析了上述三種類型大國的海洋發展模式對中國的借鑒和啟示意義，並落腳到歷史和現實的國際政治中，解讀了相關代表性國家與中國在海洋地緣政治上的互動關係。例如，引導學生結合中國從封建王朝時期對抗北方遊牧民族到近現代的陸上威脅和邊界紛爭，以及法國謀求「天然疆域」和歐陸霸權的歷史，分析中國和法國同樣作為陸海複合型大國在海洋強國建設問題上的痛點和難點，進而得出陸海複合型大國制定海洋戰略需要走陸海統籌新路的結論。

在課堂展示和分組討論環節，我們專門用一次課由各位同學就「『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如何建設現代海洋強國」展示自己的所思所想，尤其鼓勵他們為中國的海洋強國建設提出可行路徑、設計有操作性的方案。期末考試或結課論文的選題雖每年都有所變化，但至少有一題是對現實問題的關照和思考，如「中美戰略競爭背景下的南海維權策略」等。如此一來，選修《世界海洋文明史》，志在「向海搏擊」的同學，就能不斷增強抵制「西方中心主義」侵蝕的意識，將個人旨趣與國家發展、民族振興和人類進步結合起來，實現從「小我」到「大我」的昇華。

三、大學通識教育要注重「中國敘事」

長期以來，西方敘事在海洋文明史敘事中佔據統領地位，目前日益暴露出其狹隘性、偏執性、片面性的缺陷，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堅持以「文明中心論」「文明優越論」「文明衝突論」來解釋海洋文明體之間的關係。

在意識形態對抗、大國戰略競爭、地緣政治博弈回歸的今天，特別是在逆全球化現象愈演愈烈、冷戰思維捲土重來的情況下，西方敘事更加主動地充當宣傳和輿論戰的工具，並以濃厚的意識形態偏見，借助「借古諷今」的方式為現實政治服務，如前文所述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說。在這種背景下，全球文明倡議吹響了以中國敘事反擊西方敘事的號角，也警示我們在科研和教學中不能簡單地奉行拿來主義，要堅定教學理念的中國化原則。

（一）堅持文明的平等性，反對「中心論」

「文明」產生於西方和近代早期特殊的歷史語境中，從一開始就帶有鮮明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及種族優越感。「西方中心主義」本質上就是西方文明對非西方文明的歧視^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議，呼籲共同宣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⑤，首先要求我們必須堅持文明的平等性，反對一切形式的「中心論」，尤其是不能盲目地抬高本國、本民族的文明地位，斥責異域文明是低級、落後的文明。換言之，無論是近代中國固步自封的「華夷之辯」，還是近代西方傲慢的「文明戰勝野蠻」之說，都應予以批判。

今天的中國早已從昔日「天朝上國」的迷夢中清醒過來，並對近代因閉關鎖國而導致落後挨打的屈辱歷史進行了深刻的反思，進而揚棄了傳統觀念中不合時宜、因循守舊、僵化落後的部分，以更為寬廣的「世界大同」理念來重新認識自我及認識世界，尤其是認識到文明的偏見和歧視所帶來的巨大傷害，從而在全球文明倡議中高舉文明平等的大旗。相反，西方世界卻依然沉浸在「落日餘暉」中無法自拔。誠然，西方世界自地理大發現和大航海時代開啟後逐漸崛起，在數百年的時間裡創造了超越以往任何一個時代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特別是大大推動了人類海洋文明的進步，同時掌握了解釋世界的話語權，從而開始自我塑造起「西方中心論」。「西方中心論」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盲目相信西方模式是迄今為止人類最先進的發展模式，任何與之背道而馳的發展理論、價值觀等都是「異端」或「逆流」。隨著中國式現代化散發出的光芒愈加璀璨，「西方中心論」者在失落之餘開始愈加表現出恐慌，他們竭力對中國進行意識形態攻訐，拒絕「自我革命」，反復論證並強調西方文明的優越性，這實際上是一種極度不自信的表現。

（二）堅持文明的多樣性，反對「模式論」

文明的多樣性提倡文明應是百花齊放、爭奇鬥豔、姹紫嫣紅的，而非單一、模式化的。堅持文明的多樣性，必須尊重不同文明的成就和創見。西方敘事中的所謂「普世價值」，本質上是將西方理念、西方標準奉為全球治理的唯一圭臬，試圖推動實現人類價值觀整齊劃一的西方化^⑥。

反對「模式論」，還必須以發展的眼光看待文明。我們以《世界海洋文明史》教學中經常涉及的「海權」（sea power）概念為例。自馬漢提出「海權論」以來，關於海權的定義眾說紛紜，但無外乎將「power」解釋成「權力」或「實力」，進而認定海權描述的是一個國家對海洋的控制權，包括佔有和利用海洋資源的能力，以及阻止競爭對手或敵人利用海洋的能力。隨著科技和時代的進步，特別是二戰後大批亞非拉國家獲得獨立和解放，以新興民族國家身份出現在國際舞臺上並要求獲得對海洋事務的發言權，中國學者順應時代潮流，以中華海洋文明「和合文化」為思想淵源，創造性地發展了海權概念。在中國敘事體系中，「海權」之「權」不僅是「權力」（power），更是「權利」（right），即包括內陸國在內的世界各國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平等利用海洋的權利，特別是分享作為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的公海資源的權利。儘管海權誕生於西方語境，但隨著國際海洋關係的擴展和複雜化，海權早已不是西方國家的專屬概念，它所依據的西方現實主義政治也暴露出諸多問題。中國學者對海權概念的創造和發展，更加契合和平、合作、共贏的時代呼聲，是對堅持以西方理念、西方模式解釋海洋關係的有力駁斥，更是對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價值觀的弘揚。換言之，海權是



多樣的,至少「中國式海權」不是「馬漢式」的,而是厚植于中華海洋文明土壤之中的新型海權。同樣地,海洋文明也不只是「古希臘式」或「西方式」的,而是因地制宜、形態多樣、色彩紛呈的。

有鑑於此,《世界海洋文明史》在教學中,就反復強調不可「崇洋媚外」,也不可「借古諷今」,更不能「以西為貴」,自覺做到「尊卑有序」。體現在參考書目上,就是在英文文獻之外,增加中文、日文文獻的比例,並鼓勵有基礎、有條件的同學多閱讀法語、德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越南語、馬來語等小語種文獻,以「原汁原味」地理解不同地區、國家和民族的海洋文明史。

（三）堅持文明的包容性,反對「衝突論」

「衝擊—反應」模式長期被看作是近代以來東方和西方交往的主要模式,這就隱含了包括中國在內的民族國家「全盤西化」或「抵制西化」的衝突邏輯。一方面,我們必須堅決批判西方文明的「零和博弈」思維;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以對抗或「反向凌駕」心態對待西方文明。換言之,在遭遇強勢的西方文明的衝擊和挑戰時,擁有深厚傳統文明基礎的民族國家應該如何以正確心態面對,就考驗傳統文明的包容性和韌性。「文明的衝突」雖然在歷史上客觀存在,但這種衝突從更廣的時空角度看,也是文明之間交往的特殊形式。相較於碰撞和衝突,文明之間更多是交流互鑒、融合共生的關係,「文明的衝突」並不是必然的。在比較中西文明時,我們要客觀看待兩者的優長,正視各自的不足,在辨析差異中更注重觀察彼此的互補和共生關係。包容性也意味著互鑒性,文明之間需要交流才能共同進步。「一種文明從舊平衡狀態邁向新平衡狀態的過程正是通過在以自己為主體的基礎上包容其他文明,將自身本土文化與外來文明因素有機整合而實現的」^⑦。「四大發明」之一的羅盤傳入阿拉伯世界和歐洲,為地理大發現和大航海時代的開啟奠定了技術基礎。鄭和能七下西洋,也得益於年幼時在麥加朝聖旅途上向阿拉伯航海家學習了航海知識。正是不因差異而抵觸,不因短處而自卑,中國人、阿拉伯人、威尼斯人、熱那亞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等才創造了航海史上的諸多壯舉。

英語中的「civilization」原為由詞根「civil」,即「城市的」「公民的」衍化出的「開化的」「進步的」之意,是與「野蠻」相對的,表達出物質和精神形態的高下之別。以這一邏輯為主線,西方文明在發展過程中始終強調先進與落後、文明與野蠻、開化與愚昧的對立,漸漸形成了物質主義、理性主義、實用主義的特性,表現出強制性、片面性、暴力性的消極一面。相比之下,中華文化典籍和傳統敘事中的「文明」,強調因人而文,因人而明,因人有止而文明,因人之性、情、德而文明,一開始就有著照臨四方、協和天下的理想。換言之,我們的文明觀的內核就是以人為本、天下大同^⑧。

《世界海洋文明史》的教學始終緊扣中西海洋文明的差異性做文章,通過比較鄭和下西洋和達·伽馬「發現」印度給當地人留下的觀感為切入口,分析出中華海洋文明珍視和平、崇尚和諧、強調秩序、注重禮儀的特質,並指出達·伽馬在印度和印度洋上的劫掠、欺騙、征服等行為折射出西方航海家在地理大發現和大航海時代的共同追求,即為了財富不惜使用「血與火」的暴力手段,由此推導出西方海洋文明從一開始就帶有鮮明的利己主義和強烈的優越感,試圖通過堅船利炮來實現所謂「文明對野蠻的征服和教化」。我們也強調,中西雖自明末以來就在中國沿海發生多次小規模衝突,但這既不是「天朝上國」對「蠻夷」的「雷霆之怒」,亦非「基督教世界」對「異教徒部落」的「聖戰」,更不是「海洋文明」對「大陸帝國」的「訓誡」,而是世界史形成時期各大洲文明交往的特定形式。即便是1840年以後的中國近代史,也更應該被理解為兩個世界、兩種發展模式的碰撞,中華海洋文明在這種碰撞中被動(如被迫開放通商口岸)或主動(如洋務運動)地汲取了西方海洋文明的先進養分、規避了其消極負面的主張,在消化吸收、因地制宜後為1949年後的中國海洋戰略貢獻了卓絕智慧,尤其在今天建設海洋強國的頂層設計中迸發出耀眼光芒。簡言之,中華海洋文明正視西方海洋文明的進取和高效,同時包容其缺陷和不足,不因近代的蒙塵和屈辱而否定自己並否定他人,堅決

抵制「文明衝突論」興風作浪。

四、結語

海洋文明史是理解全球文明倡議深邃內涵的絕佳案例，全球文明倡議是指導《世界海洋文明史》實踐通識教育理念、培育新時代英才的不二法寶。當今世界，自然災害、流行疾病、氣候變化、海上犯罪等海洋問題日益突出，它們已經成為全人類必須共同應對的挑戰，在推進全球海洋治理中打破地域、國家、觀念的藩籬勢所必然，這正是全球文明倡議的題中之義。同時，隨著數位時代的到來，人工智慧、物聯網、清潔能源等新技術的日臻成熟既解決了舊有問題，但也帶來了新挑戰，同時蘊含著改變海洋文明發展走向的潛能，這都需要我們站在全人類的高度去直面新課題，始終用發展的眼光審視新趨勢和新動能。事實上，無論哪種類型的通識教育，都要有宏大的視野和正確的文明觀，順應世界發展潮流，做到與時俱進。從這個意義上說，全球文明倡議在世界觀和方法論上為通識教育的改革創新提供了豐富的思想工具。

注釋

- ① 惠小勇等：《流風甚美 芳華待灼——近觀武漢大學 130 年文脈傳承發展》，《新華每日電訊》，2023 年 11 月 27 日第 4 版。
- ② 楊國楨：《中國海洋文明專題研究》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頁 110-111。
- ③ 劉景華：《吳于廑先生的整體世界史觀述評》，《光明日報》，2023 年 4 月 10 日第 14 版。
- ④ 俞金堯：《「文明的衝突」是否存在——文明與文明衝突的話語陷阱》，《探索與爭鳴》2023 年第 11 期，頁 17。
- ⑤ 習近平：《攜手同行現代化之路——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人民日報》，2023 年 3 月 16 日第 2 版。
- ⑥ 孫志偉：《西方式全球治理的邏輯陷阱與中國應對》，《教學與研究》2024 年第 1 期，頁 117。
- ⑦ 邢麗菊、鄢傳若瀾：《全球文明倡議：理論內涵、世界意義與實踐路徑》，《東北亞論壇》2024 年第 2 期，頁 7。
- ⑧ 沈湘平：《實現有原則高度的文明實踐》，《光明日報》，2024 年 3 月 22 日第 11 版。

參考文獻

- ① George Modelski & William R. Thompson. (1988).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1993, London: Macmillan.
- ② 胡德坤等著：《英美德日海洋戰略的歷史演進及其現代海洋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5 年版。
- ③ 劉丹凌、匡貝茜：《新時代中國形象傳播的話語實踐邏輯》，《外國語文》，2024 年第 5 期，頁 133-146。
- ④ 劉新華著：《中國發展海權戰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 ⑤ 林肯·佩恩（著），陳建軍、羅燦英（譯）：《海洋與文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Editors: LI Ruobing & Bonnie WANG)